

# 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编写中的 故事讲述与精神传达

于小植

**摘要:**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编写的目的在于向外国学习者介绍中国文化知识、提高其跨文化交际能力,也在于通过中国文化的影响力更新其文化意识,并以其理解、适应、认同中国文化为终极目标。目标的达成需要文化教材的编写者从蔚为大观的中国文化中选取最具感召力、最适宣传播的内容,同时呈现形式要符合跨文化传播和跨文化接受的基本规律且行之有效。在众多的呈现形式中,故事无疑是最使其喜闻乐见的形式,以故事作为文化信息的载体来传达丰富的文化内涵最容易让外国学习者理解和接受。因而,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编写须秉持中国文化贡献世界、中国智慧与世界分享的编写理念,为外国学习者讲述洋溢中国精神、凝聚中国智慧的中国故事;讲述由展示文化名片到传递文化内涵的中国故事;讲述富于真情实感、能够引发共情的中国故事;讲述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中国故事。

**关键词:**文化教材;中国故事;中国文化;中国智慧;外国学习者

**中图分类号:**H19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106(2023)04-0040-09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方根据自身的想象和需要使‘中国形象’在‘智慧的摇篮’‘破败不堪的旧船’‘东方天堂’‘人间地狱’‘沉睡的巨龙’‘红色的威胁’等状态中东奔西突。”<sup>[1]</sup>我们需要面向国际社会建构稳定而积极的中国形象,而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是讲述中国故事、传达中国精神的最佳平台。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中,应重点讲述以下类型的中国故事。

## 一、讲述洋溢中国精神、凝聚中国智慧的中国故事

中国文化传统深厚,儒家文化、道家文化、佛教文化是中国的三大思想体系和文化根脉。这三大思想体系既各有特点,又彼此吸收、互相交织,逐步形成了“刚健有为、和与中、崇德利用、天人协调”<sup>[2]</sup>“天人合一、以人为本、贵和尚中、刚健有为的中华文化基本精神”<sup>[3]</sup>(P6-7),以及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中国文化内核。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故事正是因为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的支撑才愈加丰厚、愈加饱满。一直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具有很高的认知度和广泛的影响力,如何讲出新意而不老调重弹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我们需要在优秀传统文化所孕育的精神标识方面下功夫,注重挖掘精髓,并对具有当代价值和世界意义的文化故事进行重点搜集和提炼。

收稿日期:2022-10-23

基金项目: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重大项目(22YH05A)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于小植,北京语言大学(北京100083)文学院教授。

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中有所体现。但儒家文化思想体系复杂,外国学习者的汉语语言能力有限,如何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中呈现儒家文化的内容一直是教材编写的难点。以往的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一般以专章的形式列举儒家文化的代表人物和主要思想。这种编写方式的优点是直观,缺点是没有考虑外国学习者的接受能力。思想价值观层面的文化原本就不易理解,再加上大量的生词、语法的负担,给外国学习者的理解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更无法奢谈文化接受和文化认同了。

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可以采取“润物细无声”式循序渐进的方式来呈现儒家丰富的文化内容。初级文化教材和中级文化教材可以将最能代表儒家文化核心的名句或小故事自然而然地融入课文内容之中,让学习者通过具体生动的故事了解儒家的代表性观点。而高级文化教材则可以对儒家文化进行系统性介绍,有点有面、点面结合、层递深入地立体化呈现,帮助外国学习者上升到理性认识的层面。例如,可以以孔子、孟子、荀子三位儒家代表人物为中心,以《孔子说“仁”与“君子”》《孟子说“义”》《荀子说“礼”》为题目,有序呈现儒家的三个代表人物和“仁”“义”“礼”三个儒家文化的核心要素,向外国学习者系统介绍仁者爱人、舍生取义、中庸之道等儒家文化的核心内容,以及“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家国天下”等中国传统的思想观念。总的来说,初级、中级、高级文化教材的编排方式需要有线索、有关联、有重点、有趣味、成体系,这样才能使外国学习者把握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要义。

道家文化也是文化教材需要呈现的重要内容,同样可以采取循序渐进、层递深入的编写方法,以如下为例。首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过“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这一理念既是当代中国的生态观念,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一脉相承,可以把这句话以对话形式编入初级文化教材中;其次,《道德经》第四十四章有云:“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4](P98)第四十六章有云:“故知足之足,常足矣。”[4](P101)在许多当代中国人的身上都可以看到这种“知足常乐”的精神,“知足常乐”“上善若水”等重要的道家思想对当代中国人的影响仍然很大,可以以小故事的形式编入中级文化教材中;最后,中国有许多体现辩证思想的文化词汇,例如,“福祸相依”“居安思危”“苦尽甘来”“否极泰来”“塞翁失马”等,这些词汇正适合向外国学习者讲述和传播中国智慧,适合编入高级文化教材中;此外,《山木》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庄子不以物役的智慧,以及无用之用乃为大用的立身之道;庄子和惠子濠梁观鱼的故事既生动有趣,又集中体现了道家思想,这些都适合编入高级文化教材中。在高级文化教材中,因为学习者已经具备了较高的汉语水平,道家文化可以作为独立单元分为三课呈现,第一课由“反者道之动”入手让学习者了解美丑、善恶、有无等概念相反相成并能够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道家观念;第二课通过“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向学习者介绍道家“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第三课通过庄子和惠子的“濠梁之辩”让学习者了解道家的思辨传统。这样,基本上可以实现对于道家文化有层次有逻辑的介绍。

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之外,佛教文化也是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需要有所提及的内容。很多外国学习者对佛教,特别是禅宗感兴趣,但是这方面的内容相对抽象,即使对于中国人来说,理解起来也有一定的难度。李泽厚曾解释过禅宗的三种境界:“第一境是‘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这是描写寻找禅的自体而不得的情况。第二境是‘空山无人,水流花开’,这是描写已经破法执我执,似已悟道而实尚未的阶段。第三境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这就是描写在瞬间中得到了永恒,刹那间已成终古。在时间是瞬间永恒,在空间则是万物一体,这也就是禅的最高境地了。”[5](P208)可以将其编入高级文化教材中。此外,方立天的《中国佛学思想精华》一文提出,“缘起因果,求智修善,平等慈悲,中道圆融”是中国佛学的思想精华,文章言简意赅;楼宇烈的《正确认识佛教》一文,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讲述了禅宗的问题;吴言生的《六祖慧能的传奇一生》一文故事性强,生动有趣,也都是适合编入文化教材的素材。

不仅佛教文化的机锋禅趣和缘起性空的观世态度可以使外国学习者对中国文化具有更加

丰富立体的了解,墨家的“兼爱非攻”主张和科技思想、《易经》中的“变动不居”思想同样是中国智慧的集中体现,对当今中国乃至世界仍然具有启发意义,因而也是文化教材中不可或缺的内容。

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对于“中国智慧”的呈现方式不应是枯燥的说教,而应以有趣的文化故事来表现。例如,《世说新语》中记载了“王戎识李”的故事:“王戎七岁,尝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竞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旁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6](P58)“王戎识李”的故事体现了一种“见山不是山”的智慧,此外,“郑相却鱼”“陶母退鱼”“曾子杀猪”等也是适合编入文化教材中的故事。故事就是“叙事”,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说:“叙事作品不分高尚低劣,它超越国度、超越历史、超越文化,犹如生命那样永存着。”[7](P2)

中国文化底蕴是中国文化自信的源泉,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编写需要对中国文化披沙拣金,在有限的教材空间中,呈现中国文化的风骨和萃取后的精华,讲好凝聚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的中国故事。

## 二、讲述由展示文化名片到传达文化内涵的中国故事

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编写的目的是让外国学习者了解中国的文化现状及文化根脉,在情感上理解并认同中国的文化选择,因此要注重文化符号的选取以及编排方式。文化符号是指以语言、文字、图片为载体的文化信息,在国家与国家之间、国家与民众之间或民众与民众之间的文化交流中,文化符号被误读的情况普遍存在。在中国文化传播的过程中,要避免文化符号被误读、被混淆,就需要编写者选取独具中国民族特色和代表性的中国文化符号,即中国文化中极富生命力、传承性和代表性的部分,历经漫长的历史积淀依然熠熠生辉的部分。

文化符号具有强大的文化形象建构能力,可以用来表征文化特性,帮助外国学习者生成对中国文化的最初感知并形成生动鲜明的文化记忆点,具有经典性、标识性和象征性的传统文化符号是饱含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化名片,它们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图谱,可以展示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长城、故宫、中医药、瓷器、丝绸、玉器等就是具有经典性、代表性和象征意味的中国文化名片,中国故事从这些为外国学习者所熟悉的中国文化名片讲起,有助于外国学习者快速建构起对于中国的认知。

编写“旅游文化”单元可以选择长城、苏州园林、兵马俑等中国旅游文化名片;编写“地理文化”单元可以选择三山五岳、长江、黄河等中国地理文化名片;编写“城市文化”单元,可以以北京、上海、西安等城市为代表;编写“建筑文化”单元可以向外国学习者介绍故宫、老北京的四合院、苏州园林等中国建筑文化名片。同时还可以将“不到长城非好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登黄山,天下无山”“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等俗语名言编入课文,以此介绍这些中国文化名片的文化内涵。

中山装、旗袍、唐装是三种最具中国特色的服饰,可谓是中国服饰文化的名片,在文化教材中可以选择这三种特色服饰介绍给外国学习者。把经常穿此种服饰的文化名人与服饰一并介绍,可以让服饰“活”起来,增强课文的故事性和叙事色彩。例如,在介绍“中山装”时,可以由中山装的款式特点引申到孙中山的治国理念,使外国学习者既了解了中山装,又了解到中国的文化名人及其思想理念;介绍“旗袍”时,为了避免枯燥,同样需要淡化“说明文”色彩,把“旗袍”与“穿旗袍”的人结合在一起进行讲述,例如,可以介绍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偏爱旗袍,抗战时期,宋庆龄女士曾经送给美国友人波利·巴布科克一件中式旗袍,而波利正是穿着这件旗袍,为中国的工业合作社运动筹集了很重要的一笔资金的故事;中国功夫巨星成龙的文章《为什么穿唐装》故事性强、语言难度低,在介绍“唐装”时,可以将这篇文章作为文化教材的素材使用。

此外,茶、酒、玉器、瓷器、中国扇、书法、绘画等都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名片,在文化教材中都需要有所涉及。文化教材对茶的介绍不应该停留在黑茶、白茶、绿茶、红茶、黄茶、乌龙茶、花茶等茶的分类层面,而是要讲出中国人对茶的理解以及中国的茶文化。无论是“琴棋书画诗酒茶”,抑或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茶从未远离中国人。它不仅是中国人的日常饮品,也是平凡生活中的美学起点。历经千年,茶文化糅合了儒、释、道诸派思想,独成一体,生生不息。酒文化在中国由来已久,酒可以成欢,也可以忘忧,在中国,所有婚丧嫁娶等重要仪式都离不开酒,酒渗透于中华民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中国以酒为主题的名篇佳作可谓俯拾皆是,古有李白的《将进酒》,今有梁实秋的《饮酒》、陆文夫的《做鬼亦陶然》,读之令人兴味盎然,也是适合编入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的内容。另外,玉石、瓷器、扇子也是中国文化的名片。许慎认为玉有五德,他在《说文解字》中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璵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忤,洁之方也。”[8](P10)中国是瓷器的发源地,瓷器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扇子也起源于中国,至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团扇在唐宋时期风靡一时,文人们乐于在团扇上题诗作画。到了元明时期,兴起了使用折扇的热潮,折扇也逐渐取代团扇成为文人墨客挥毫泼墨的载体。今天,折扇仍然是中国人的生活与艺术作品中常见的一个文化要素。这些内容都应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中有所体现。

再有,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还应该从饮食、节日、民俗等角度选取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名片来讲述富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故事。例如,饮食文化中可以介绍烤鸭、饺子、火锅、宫保鸡丁等中国特色美食,以及南甜北咸东辣西酸的中国饮食习惯;民俗文化中可以介绍中国的年俗、婚俗;节日文化中可以介绍春节、清明节、中秋节等不同的节俗。

因为文化差异的普遍存在,展示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内容容易激发学习者的好奇心和学习兴趣,但文化教材的编写却不能停留在对于中国特色和中国名片的展示层面,而是需要完成阐释中国文化名片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文化价值的重要任务。荷兰跨文化专家霍夫斯泰德(Geert Hofstede)曾经提出了“洋葱文化论”,将文化比作一个层层包裹的洋葱,“洋葱的外表一层是指服装、语言、建筑物等象征物;第二层是民族性格,第三层是礼仪,最核心的一层是价值观,价值观是文化中最深奥的部分,它是文化的基石。不同文化对世界和自然有着不同的理解和看法,有不同的价值观,这些都会影响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9](P5)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需要处理如何将文化名片的平面展示过渡到文化内涵的立体深层次揭示的问题。在体现文化多元化、多样性、生动性的同时,要思考如何保留中国文化的系统性和整体性的问题。从中国文化名片讲起是文化教材的编写策略,发掘作为表层的文化名片背后的深层文化价值,搭建通往中国文化肌理深处的桥梁是中国文化教材编写的要旨。

四川的都江堰也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名片,如何在文化教材编写中,把作为表层的文化名片介绍与中国深层的文化观念联系到一起呢?《文化密码:中国文化教程》为外国学习者编写了这样一段课文对话:

伊人:大龙,你最喜欢中国的哪个省?

大龙:我最喜欢四川省,一是因为我喜欢吃辣辣的川菜,二是因为我喜欢那里的大熊猫。

李晶:你想起了川菜和大熊猫,我却想起了都江堰。

大龙:我听说都江堰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之一。

有朋:是的。都江堰是中国现存年代最久、目前仍在使用的宏大的水利工程。

李晶:都江堰使四川成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天府之国”。

伊人:听说都江堰最大的特点是“顺势而为”,体现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

[10](P122)

课文先串联起了大熊猫、川菜、都江堰等四川的文化名片,再由都江堰“顺势而为”的设计

理念引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中国价值观念,是比较巧妙的文化教材编写方式。把文化词汇融汇在人物对话之中,可以帮助外国学习者同时提高文化理解能力和口语表达能力。

另外,中医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也是外国学习者感兴趣的话题,在教材编写中,应该重点介绍中医这一文化名片。中医诊治疾病注重整体性,反对“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中医认为人体内部除了“有形的整体”,还有“无形的整体”,而后者与中国文化的重要概念“气”有关。中国人认为天地自然和人的生命都来自“气”,“气”是生命的基础,生命是一个气脉流动的整体,气在则生命在,气竭则生命亡。中医的治疗方式是中国人生命观和宇宙观的体现。因此,望闻问切的中医诊断方法,针灸、按摩、拔罐、刮痧等中医的非药物疗法,“阴阳二气相互对立,而又相互依存”的中国文化理念都是有必要在文化教材中向外国学习者介绍的内容。此外,中医强调保持身体平衡、防病于未然,中医的此种理念与万物休戚相关、防患于未然的中国智慧一脉相承,也是应该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中有所体现的文化内容。时代变迁,但“医者仁心”的精神却被中华老字号北京同仁堂世代传承下来。既尊重传统,又不被传统束缚;既大胆创新,又不离经叛道。同仁堂把儒家“仁义”的精神和现代经营理念相融合,是中华老字号中的成功典范,是值得传播的中国文化名片。但编入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的内容要由文化名片引申出文化内涵,让外国学习者在知晓中医相关知识的同时,也了解到中医的理念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思想、道家思想表里相济、一脉相承。中医的传统技法、中华老字号,它们从远古走来,绵延到了当下,现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都与传统相关,所以了解了传统中国就理解了当代中国。

璀璨的中国文化为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的编写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教材编写者在展示中国文化名片的同时,需要对文化名片中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挖掘和阐释,才能让学习者感受到中国文化的魅力,才能帮助学习者完成对中国文化的从个别到一般、由感性到理性的认知。

### 三、讲述富于真情实感、能够引发共情的中国故事

讲述中国故事的目的是传达思想、沟通心灵,因而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所讲述的中国故事能否引起外国学习者的兴趣,能否引发他们与中国文化的共鸣并与中国文化产生互动融合至关重要。哈贝马斯(Habermas)曾提出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是话语的三种“有效性要求”[11](P16),这对于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的编写不无启示,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所呈现的内容需要具有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因为这是人获得他人理解的“普遍有效性要求”。对于文化教材编写来说,语言的运用要符合逻辑,具备可理解性;所选择的内容必须以真实为条件,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情境;叙述时态度须真诚,将真情实感和价值观念融入教材内容之中,以真诚来赢得学习者的信任;呈现内容的价值观念须正当,要在外国学习者公共认同的范畴之内。

歌德曾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感情方面几乎和我们一样,使我们发现他们是我们的同类人。”“世界永远是一样的,一些情景经常重现,这个民族和那个民族一样过生活,讲恋爱,动情感,那么某个诗人作诗为什么不能和另一个诗人一样呢?”[12](P112-113)乔纳森·特纳(Jonathan H. Turner)在《情感社会学》一书中指出:“情感是把人们联系在一起的‘黏合剂’,可生成对广义社会与文化的承诺。”[13](P1)也即是说,人们对社会文化领域的接受认同更多地源于情感契合。情感契合与情感共鸣会使信息的接受更为迅捷。外国学习者“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者和跨文化交际的主体,是中国文化‘走出去’与其他各民族文化形成多元世界文化格局的推动者”[14],学习者在阅读接受中国故事的过程中,通常历经关注择取、认知理解、认同共鸣的情感内化过程,情感的内化及建构的完成也即是实现了文化潜移默化的浸润乃至个体形塑。因此,要获得外国学习者的情感认同,需要讲述沉淀着中华民族优秀基因、精神追求和精神标识的中国故事,故事要富于真情实感、要能够引发外国学习者的共情。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sup>[14]</sup> 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编写中，“讲情感”就是在讲述的过程中运用真情实感来触动外国学习者内心，将文化传播诉诸情感交流之中，进而与学习者达成情感的共鸣，最终达到建构中国形象、传递中国价值的文化传播目的。例如，“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sup>[15]</sup>（P282）“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sup>[16]</sup>（P208），都能够表现出中国人对于鸟兽同情、怜悯的恻隐之心，如果编写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中，容易赢得外国学习者的好感，容易激发外国学习者的同体大悲意识，各国人民相互守望、相互爱护是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提和基础。另外，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编写中，要尽力以对话的姿态向外国学习者传递真实感和亲切感。

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编写中，需要把握人类的基本情感，选取和提炼既能表现中国智慧又能体现真情实感的故事，用文化承载情感，用情感展示文化，与学习者之间建构一种相交、相容、相通的关系，用情感上的接近带动文化观念的认同，使外国学习者由对中国故事的兴趣转变为对中国文化的接受。2013年，莫言在孔子学院做主旨演讲时提出：“一部文学作品只有表现了人类的最普遍、最基本的感情，然后翻译成外文之后才可能打动外国的读者，一件艺术作品也只有表现了人类最基本的感情之后也才能够感动其他国家的观众。我们的汉学教育实际也是这样。只有把我们最基本、最符合人的基本情感的东西拿出来率先介绍出去，也许更能赢得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同。”<sup>[17]</sup> 莫言所强调的这种基于全人类体验的普遍情感受到政治、地域、人种的差别的影响较小，是打开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可以说，寻找不同文化的共性，分享共同的情绪或情感体验是讲好中国故事的有效途径。

人类在面对个体生命时的一切所感、所思、所想中必然会渗透着人类关于生命种种的体验、想象和建构，而那些具有共性的情感就在此间诞生。包孕着情感共性的文化观念蕴含着激发外国学习者产生情感共鸣的力量，是打开跨文化传播罅隙的重要切入点，把握住这些情感可以使文化传播达到最好的效果。

对家的依恋是人类的情感，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中编写与此相关的内容就容易引发外国学习者的共情。例如，初级文化教材中可以这样编写课文：

伊人：李晶，你知道月饼为什么是圆的吗？

李晶：中秋节月圆、人团圆，把月饼做成和中秋的月亮一样的圆形，象征着团圆和睦。

有朋：中秋节全家围坐在一起赏月、吃月饼是最开心的事。

大龙：你们说得我都想家了！<sup>[10]</sup>（P96）

这段课文不仅介绍了中秋节的节俗，月饼的特点和象征意义，而且抓住了“想家”这一人类普遍情感，因此容易赢得外国学习者情感上的共鸣。

如果向外国学习者介绍中国的姓名文化，可以告诉外国学习者：

很多中国父母给孩子起名字的时候，都喜欢从《诗经》《论语》等古书中找语义美好的语汇。很多中国女孩子的名字常跟花儿有关，因为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像花儿一样美丽。

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和民族，名字中都包含着父母对于子女的祝福和期待，因此，这也是一种容易引发共情的人类普遍情感。另外，生和死，是所有的民族国家的人都会面对的普遍性问题，对于生死问题的探讨也容易引发不同民族国家人民的共情，容易激发他们用中国的文化观念与自身的文化观念进行对比。例如，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中，可以编入妻子去世后，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此外，博爱、正义、诚信、智慧、重礼等文化理念都包含超越民族国家的情感认同力量，容易引发外国学习者的共鸣。鲁迅曾满怀热情地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sup>[18]</sup>（P118）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很多英雄人物，他们的民族气节和高贵品格令人动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林则徐、“有心杀贼，无

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这些中国脊梁的故事都适合在中国文化教材中讲述,用真情实感打动外国学习者。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在国际社会上一度话语权缺失,处于“他塑”的状态之中,西方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文化心态和文化立场对中国进行的“他塑”强调的多是中国文化的异质性、特殊性以及与其他文化的不兼容性。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编写是编写者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形象的一次“自塑”,在教材中通过对具有情感共性的文化内容的展示,可以让外国学习者全面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人,感受自身与中国文化和中国人在情感上的共通性,缩小外国学习者与中国的心理距离。

#### 四、讲述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中国故事

在历史的车轮不断行进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什么?新的中国故事是如何生成的?这是很多外国学习者感兴趣的话题,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中,我们需要在宏阔的时间范围内有层次、有系统地讲述中国“从何处来、向何处去”的故事,以达到让学习者真正理解中国的目的。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文明赓续绵延了几千年,厚重、博大,对人类文明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在文学、史学、哲学、医学、农学等诸多领域都有值得广泛传播的经典。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根基,孕育当代中国和未来中国。所谓“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19](P273),源不深则无法望流远,塞源则不能欲流长。《大学》有言:“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20](P3)讲述中国“从何处来”就是讲述中国的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演讲中曾说:“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21]这句话提示我们讲述中国“从何处来”的故事时,要把中国丰富的文化遗产与深厚的文化传统、传统文化丰富的精神内涵结合起来,讲述具有时间跨度的中国故事,把对外国学习者来说较为陌生的中国故事讲述得生动、有趣、立体。

讲述中国“从何处来”的故事还应包括: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曾遭受的前所未有的危机、中华民族实现民族独立的抗争史、新中国成立初期艰难的探索、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这些讲述应该深入浅出、全面透彻,才能让外国学习者既了解中华文明的灿烂辉煌,又了解中国人民的苦难史及自强不息的奋斗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外国学习者的兴趣与疑问多侧重于他们当下耳闻目睹的当代中国,因此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讲述中国“向何处去”就是讲述由中国传统文化脱胎而来的中国当代文化,就是向外国学习者展现中国的时代变迁,结合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展现全面的中国,就是讲述和平发展、贡献世界的“中国梦”,讲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对人类未来的展望,以使外国学习者感受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和理想追求,了解当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和内外政策,更全面、客观、理性地读懂中国。

中国将“向何处去”是世界各国人民普遍关心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曾经给出过这个问题的答案,他说:“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各国人民的期待,也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应有的担当。中国方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22]如果把习近平总书记的这次讲话编入高级文化教材,就可以让外国学习者读懂中国“向何处去”。

实际上,讲述中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故事不必把这两部分分别讲述,而是可以溯古通今、由古及今地讲述。例如,“以和为贵”“和而不同”“亲仁善邻”是古代中国推崇的理念,在讲述这一文化理念时,可以选取传统和当下两个角度进行阐述。中国古代被誉为“武学之圣典,兵家之绝唱”的《孙子兵法》虽然是一部兵书,却包含着深刻的和平观念和慎战思想。《孙子兵法·始计》有云:“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23](P1)《孙子兵法·谋

攻》有云：“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sup>[23]</sup>（P21）孙子对待战争的态度体现了中国古人的仁者胸怀和超凡智慧。

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需要让外国学习者了解“以和为贵”是中国古已有之的思想观念，同时，这一思想观念在当代中国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和发展。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和平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中，刻进了中国人民的基因里。”<sup>[24]</sup>在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中，讲述中国“何去何从”的故事就是向外国学习者介绍当代中国和平发展的故事，介绍中国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发展观”“和谐世界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的外交策略和中国方案。这些当代理念能够体现出中国对于和平的追求，能够让外国学习者了解到中国在处理国际多边关系、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上所做的努力，以及中国提供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世界和平所做出的贡献。

讲述中国“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故事，也可以从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讲起。孔子这句话揭晓的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原则，这种理念贯彻到文化传播上，则表现为一种非强力灌输，亦非文化霸权的平等态度。而当秉持这种理念看待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则是强调建立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伙伴关系，“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理念与当代中国在国际交往中所秉持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原则一脉相承。在新时代的背景下，全球化使得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世界成为了多样性的统一，世界的文化也逐渐向多样性的统一发展。中国文化的发展向来以尊重各国文化的多样性为前提，既顺应时代潮流又保持自身文化特色，这实际上是古代中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延伸，它既标明了中国的来处，又指明了中国的去向。

一言以蔽之，给外国学习者讲述的中国故事需要来自历史深处，也需要蕴藏无限活力；需要让外国学习者了解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也需要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由古至今的发展演变，长盛不衰的原因，以及中国文化的当下价值。中国文化需要由自信走向他信，再走向共信，这是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讲述中国故事的目的所在。

## 结 语

与其他传播形式的受众群体相比，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的受众群体作为中国文化的学习者，对于传播内容的接受态度更加积极，加之，教材本身具有专业性、权威性、说服力强的特点，因此，以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作为讲述中国故事的平台容易引发外国学习者的关注和共鸣，容易获得他们的理解和支持。

中国文化的优势在于文化的传承性、正确性、有效性，经过几千年的文化沉淀和传承创新，中国文化中累积了大量可供全世界分享的哲理与民族智慧。国际中文教育文化教材中的中国故事，既要彰显中国文化的自信与自觉意识，又要能激发外国学习者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因而，要注重选取洋溢着中国精神、凝聚着中国智慧、呈现着中国风貌的中国故事，故事或承载中国的风土民情，或承载中国的思想观念和价值理念，但都需要逻辑清晰、生动形象、内涵丰富、感召力强并且耐人寻味，要凸显能够代表中国形象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为外国学习者理解中国发挥积极作用。

### 参考文献：

- [1] 于小植. “中国形象”的他塑历程与自塑路径[J]. 华夏文化论坛, 2021(2).
- [2] 张岱年. 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J]. 中国文化集刊(第1辑),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4.
- [3] 张岱年, 方克立. 中国文化概论[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 [4] 李聘. 道德经[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8.
- [5] 李泽厚. 中国古代思想史论[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6] 刘义庆. 世说新语·雅量[M].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18.
- [7] 罗兰·巴尔特. 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A]. 张寅德. 叙述学研究[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9.

- [8] 许慎. 说文解字 [M]. 长沙: 岳麓书社, 2019.
- [9] Hofstede, G. *Cultures and organizations: software of the mind: intercultural* [M]. London, HarperCollins, 1994.5.
- [10] 于小植. 文化密码: 中国文化教程第2册 [Z].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 [11] 哈贝马斯. 交往行为理论 (第1卷) [Z].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 [12] 歌德著. 歌德谈话录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7.
- [13] 乔纳森·特纳, 简·斯戴兹著. 情感社会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 [14] 习近平. 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EB/OL]. 新华网, 2016.2.19.
- [15] 薛茂盛. 万全古韵 温州童谣歌谣俚语民俗大集 [Z]. 杭州: 西泠印社出版社, 2017.
- [16] 孟轲. 孟子·梁惠王上 [A].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7] 莫言. 孔子学院: 怎样讲好中国故事 [J]. 商周刊, 2013(12).
- [18] 鲁迅. 鲁迅全集(6)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 [19] 魏徵. 谏太宗十思疏 [A]. 吴楚材, 吴调侯. 古文观止 [Z]. 武汉: 崇文书局, 2010.
- [20] 朱熹. 四书章句集注 [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21] 习近平. 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N]. 人民日报, 2014-03-28.
- [22]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 [EB/OL]. 新华网, 2017-01-19.
- [23] 孙武. 孙子兵法 [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9.
- [24] 习近平. 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N]. 人民日报, 2017-01-20.

## **The Story Telling and Spiritual Communication i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extbooks for Foreigners**

YU Xiaozhi

**Abstract:** The purpose of compiling Chinese textbooks for foreigners is to introduce Chinese cultural knowledge to foreign learners and to increase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competence of foreign learners, and the purpose is also to renew cultural consciousness of foreign learners by the influence of Chinese culture. Ultimately, the goal is to foster foreign learners' comprehension, adapt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Chinese culture.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aim, the authors of cultural textbooks must carefully curate the most compelling and appropriate material from the rich tapestry of Chinese culture. Additionally, the manner in which this content is presented must adhere to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ross-cultural acceptance, while also being efficacious. Narratives are widely regarded as the most prevalent medium of expression, particularly for foreign learners. They are deemed to be the most accessible means of comprehending and assimilating cultural information, as they are imbued with a plethora of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erefore,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extbooks should uphold the compilation concept of Chinese culture contributing to the world and Chinese wisdom being shared with the world. Chinese culture textbooks for foreigners should tell these kind of Chinese stories which are full of Chinese spirit and Chinese wisdom; which from showing the cultural card to conveying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which are full of true feelings and can eliciting empathy; which are about where did China come from and where China will go.

**Key Words:** cultural textbooks; stories of China, Chinese culture; Chinese wisdom; foreign learners

【特约编辑: 陈 晨 实习编辑: 王伟泽 责任编辑: 联谊】